

陈独秀和“二次革命论”

李 体 显

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最后之所以失败了，其主观原因是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大革命中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采取了软弱无能的妥协投降政策。作为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为什么一再对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退让呢？其根本原因是他没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革命观，而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看问题，抱残旧民主主义信条，竭力鼓吹“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和特征。今天我们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分析“二次革命论”的反动实质和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观，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确立无产阶级革命观，从而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胜利地推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前，陈独秀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满怀救国救民的革命激情，极力效法欧美资产阶级革命。针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政治，他提倡建立“立宪共和国”，实行“共和制”，鼓吹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等思想。这对冲击封建专制主义和启蒙人们的觉悟具有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陈独秀还主张，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实行三党政治，即由国民党、进步党和北洋派三者平分政权，这又表现了陈独秀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妥协性和斗争不彻底性。

十月革命后，中国发生了标志新旧民主革命转折点的五四运动，一批先进分子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陈独秀也在这时经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随着工人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他长期主编《新青年》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誉，很快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尔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并在党的“一大”上被选为总书记。

陈独秀虽然宣传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陈独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他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确立无产阶级革命观。正因为如此，当革命形势深入发展，尤其是革命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他即表现出对革命产生动摇，缺乏信念。一九二三年二月，发生了“二七”惨案，中国工人运动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这时，陈独秀被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在思想理论上表现了极为明显的妥协。他利用了党的“二大”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的缺点，在党的“三大”前后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作了系统的错误回答。主要表现在这时他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陈独秀极力贬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

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作用他极力夸大，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还极力否定农民阶级的伟大革命作用。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社与会各阶级》）据此陈独秀这样看待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前途：国民党“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无产阶级也明知道此种国民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他认为在第一次革命中，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只有等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被称为机会主义的理论“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失败后，又继续发展为取消主义。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的叛变，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所建立的反革命政权，已经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封建势力已成为残余。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斗争。因此，他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特别是武装斗争。甚至污蔑红军是“土匪”，谩骂人民革命战争是“流寇运动”。妄图取消中国革命。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论，它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观，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完全割裂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放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二次革命论”就是鼓吹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和用以维护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反动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则是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和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正是从这种错误的理论出发，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不但不去扩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反而对资产阶级右派采取一味退让妥协的政策。这种妥协和退让，最明显地表现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三次让步和对北伐战争所采取的轻贱消极的态度上；在国民党的“二大”丧失了扩大革命力量的有利时机，使国民党右

派分子大奏凯歌；在“中山舰事件”中和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使蒋介石先后篡夺和攫取了部分军权和党权；又使蒋介石夺取了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为他以后屠杀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而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观，来源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陈独秀一八八〇年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曾留学日本、法国，接受近代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影响尤深。他有感于封建思想文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进步的严重危害性，创办《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和文学革命，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但陈独秀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包袱毕竟是太沉重了，他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还是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问题。譬如，他信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说，“群众意识”“惰力甚大”，“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仍然认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去了理性。”陈独秀曾多次把群众称为“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主张要由少数人对群众实行“干涉主义”。因此，他就不可能与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陈独秀鼓吹“二次革命论”的主要根据，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中国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这种认识是建筑在他对中国社会力量所作的唯心主义的阶级分析之上的。他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看事物不看本质，只看现象，不看主流，只看支流，看中国工人阶级，不是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出发，充分认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特殊历史地位，以及由其经济地位所形成的彻底革命的阶级本质，而只是看其年令较轻，人数较少，文化较低和思想上所存在的某些落后方面；看农民阶级，不是看它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作用，而只是看它“居处散漫”、“文化低”等长期形成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却又闭而不谈。陈独秀这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必然得出，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唯有资产阶级“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能充当帮手而不能掌握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他不进行认真思想改造，不接触工农调查研究，而是醉心于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常常以“伟大”的“先知先觉者”自居，根本不懂得革命发展的辩证法。他的思想经常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旧民主主义观念，几乎窒息了他的整个思想，使他经常处于畏葸不前，徘徊犹疑之中。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陈独秀一步步堕入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泥坑，最后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从陈独秀走过的由革命到反革命，由前进到倒退，由起积极作用到起消极和反动作用的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出：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只能确立资产阶级革命观，不可能确立无产阶级革命观。而资产阶级革命观则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而不能引向胜利。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无产阶级革命观指导革命运动，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革命实践一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背离这条根本原则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只能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陈独秀鼓吹

（下转35页）

可见，把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所讲的“矫枉必须过正”和“过犹不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有的同志往往还举出类似下面的例子来企图否认过犹不及，并以此说明一时的度是必要的。说一根向左弯的铁条把它直起来，一定要超过中界线，向右弯一弯，不然铁条就不会直起来。其实引用这个例子是说明不了问题的。这根铁条赖以存在的度，是其向左弯或向右弯都不致折断的界限，亦即力学上所讲的弹性限度，而不是中界线。中界线只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弹性限度的中界点。为了把铁条直起来，使其超过中界线向右的弯动，只是在铁条“度”的范围内的运动。所以这个事例证明不了一时的过度是必要的这一观点。它只能说明要把铁条直起来，必须加一个外力，破坏弯铁条在原来位置上的力的平衡，而达于中界线位置上的新的平衡。

总之，过去人们采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对“过犹不及”这一辩证法命题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林彪、“四人帮”则是利用这种错误，把它发展到极端。于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上三倍”，“凡事左三分”等等极左谬论大肆泛滥起来。一时间，理论被推上了顶峰，领袖被捧上神殿，精神被宣扬为万能，生产关系被认为可以穷过渡。总之一切“左”的东西，都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红”极一时，“红”得发紫，可结果如何呢？还是“过犹不及”。对领袖的神化变成了丑化，穷过渡变成了过渡穷，精神万能变成了精神贫困，十年内战，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切极左的东西都落到了最不干净的地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段历史已从反面证明，“过犹不及”是辩证法的一个普遍真理，不承认它，它仍在发挥作用；蔑视它，必然要在实践中受到惩罚。

雨过天晴云散尽，驱除四害朝晖起。三年前，我国结束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残所造成的一场大灾难，进入了一个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为了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为了胜利地进行“四化”建设，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宣传“过犹不及”辩证法，应当使人们懂得：干什么工作，都必须顾到客观条件，顾到事物发展客观过程对度的要求。进行阶级斗争，搞“熄灭论”不行，搞“扩大化”也不允许。进行建设拖拖拉拉上不行，许多项目一涌而上也不行。不讲速度不行，太快了也会是欲速而不达。总之，超过了客观事物应有度，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严格掌握各种事物的度，在“四化”建设中，把各项工作做好。

（上接第38页）

“二次革命论”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血的教训，我们应引以为戒。

现在我们正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胜利进军。在开展大规模四化建设的今天，革命的形势不仅不同于过去的民主革命时期，也不同于建国以后的五十、六十年代的历史条件，现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化建设突飞猛进，新的课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不断研究新情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从而正确地解决处理问题，努力避免和少犯错误，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努力。